

生活化：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种文学研究新方法的可能

卢敦基

【摘要】：文学的经典化，一方面由专业研究机构评鹭认定，另一方面，则由读者大众百姓自发造就，而后者或许更为重要。大众百姓在生活中或有意或无意地频繁使用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和表达，使得文学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广泛进入生活领域，最终使该作品获得经典地位。此即文学的生活化。这种文学经典化的独特过程建立于雅俗共赏的基本原则之上。而始生于唐、确立于明的雅俗共赏文学鉴赏标准，则是中国话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民族特性，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标准有相当的差异。大众百姓需要优秀文学经典作品，是出于认知、交往、学习模仿、表达生命体验和精神追求等各种需求。文学生活化的表现途径十分多样，有专名、词汇、人物、场景、解读戏研、衍生等种种。在今天这个大数据时代，检测文学生活化的数据，为判别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提供了一个较为准确的依据。文学生活化的研究有可能打开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关键词】：文学经典化 生活 雅俗共赏 计量方式

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人读到。所以新创作的文学作品如何争取产生更大影响并流传下去，换言之即文学的经典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实际努力方向与学术研究内容。十多年前，国内学术界对文学经典化已有过较为热烈的讨论，对其概念、形成过程及变迁规律等有较为深入的探讨。¹相形之下，文学创作和评论界似乎更自觉地行事：对一些予以重视的作品，必召开研讨会，撰写专题评论，并以进入选本、获得奖项为标志，以占领作为教材的文学史著作作为最终归宿，此情形正如哈罗德·布罗姆在《论经典》所说“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²。不过此类行为都较具有单方面的意味。同时，我们也都看到，文学经典化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直悄无声息地大规模地进行。优秀文学的大多数接受者即大众百姓并不很关心学术话题，也不一定受专业文学评论的影响，他们只以是否感兴趣为标准选择阅读对象，也以此标准将读到的内容加以广泛使用，这才是文学作品在社会生活中流传的通常情形。

所谓文学的生活化，指的就是文学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广泛进入大众百姓生活领域的情形。文学作品的任何一个组成构件——人物、情节、对话、描写、场面……甚至衍生物都可能进入大众生活。而且进入生活形式多样：最普通者言说、交流、曲解、嘲讽；超越普通的爱好者很可能模仿、借用；更倾心且具创造性者则可能改写、续写、戏研、写同人作品等等，此外还有影视、戏剧、小品、相声、动漫、歌曲、文创产品等种类繁多的演绎方式。大众生活无所不包、无远弗届，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到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皆在其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生活化的广度、深度和时间延续的长度，可以说是文学经典化的一个可度量的标准。这些文学作品，有可能是成为经典后进入生活，更有可能是由于进入生活太深太广，进而成为经典。在文学生活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测量的今天，它很可能成为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尤其是相对于专家学者的专业评判而言。

文学的生活化之所以可以测量，是因为在当下，人们的日常活动已经高度网络化和社交媒体化，而互联网，包括微博、微信、博客、QQ、B站、抖音、推特、脸书(现改名为“元宇宙”)、照片墙、YouTube等社交媒体以及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是有记忆的，人类行为都会在其中留下数据痕迹。当海量的个人数据集合在一起，便构成大数据，从中可窥探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及其演变。譬如，《韦氏词典》将 vaccine(疫苗)选为2021年的年度词汇，该词典总编辑指出，该词在2021年的搜索量同2020年相比飙升了601%，比2019年增加了1048%。这就是测量人类生活的一个个案。³同理，我们也可以基于人类的文学行为数据对文学生活化的具体表现进行测量。

要说大家对于生活化这一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路径完全无知无觉，那是厚诬。但对这一路径没有足够的重视并探讨其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可能，则是事实。应该说，在当下文学评论和研究的话语体系中，文学作品的生活化这个概念尚未形成，遑论深入研究它的发生情形和内在机理以及它在判别文学作品是否经典方面的应用。笔者对此积思有年，此次勉力写出，以求教于识者方家。

一、文学经典生活化的内在依据

将文学作品的生活化作为认定文学经典的关键标准，必须先谈中国判别文学经典的重要原则——雅俗共赏。雅俗共赏原则是文学经典生活化成为可能的内在依据。一个社会尽管经常存在高级文化与底层文化的分野，但对某些东西，仍有达成共识的可能。确认了“雅”与“俗”对文学经典的反应有极大的相通，文学的生活化才能作为经典判别的有力依据。

雅俗共赏是判别文学作品是否经典的重要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大家殆鲜疑问。这个判断所包含的意思是：凡是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均是经典作品。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不能雅俗共赏的就不是好作品。我们承认针对上层的文学作品也有经典，中国南北朝以前的文学，这种情形尤为普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在中国目下，大家都认为：符合雅俗共赏标准的文学作品，应属经典之列。

雅俗共赏原则尽管确立较早，但以专文来讨论，始见于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其文作于20世纪40年代末。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原则似乎人所共知，并且大抵皆无疑义，常被当做不言自明、跨时通用的共识和立论前提，所以在朱自清后，后续的相关研究和讨论也很少见到。但实际上，朱自清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仍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自民国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对人民大众历史地位提高的强调，自胡适《白话文学史》开始，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性才被极力提升，朱自清也明确标出自己讨论这些问题是站在“现代的立场”。“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⁴不过，这种重视民众的立场，实际上并非始于民国，且看雅俗共赏一词出现的时代，就可管窥。“雅俗共赏”一词，朱自清说：“从语气看来，……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⁵这个推断颇为近情。据刘洁修考定，“雅俗共赏”一词首见于明代孙仁孺的戏曲《东郭记·八·绵驹》：“今者来到这高唐地面，闻得有绵驹善歌，雅俗共赏”。⁶而雅俗共赏的概念作为文学作品优劣判别标准的出现，实则更早，可能始于唐代。唐代一些诗歌的普及流行等众多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明证，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则一直延续了此传统。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在唐宋时期有重大变革，安史之乱后门阀制度逐渐式微，社会等级不再固定，阶层流动加速，钱穆将唐以下之中国社会称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⁷从唐代的半门阀、半官僚的政治形态向宋代的科举官僚政治的转化过程中，大批中下层士人崛起进入主流社会，此即学者所论宋代的“世俗化、平民化、人文化”⁸。正是这种社会的巨大变革，让平民百姓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他们的人生观、美学观等等也随之逐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宋代柳永虽被加诸“词语尘下”⁹“多近俚俗”¹⁰等评论，但终究改变不了柳词的广泛传播局面。“明代是通俗文学洪流滚滚。”¹¹明中叶后诸文学大家先后皆有肯定通俗文学价值或重新认识雅俗关系的言说。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社会上下阶层的互通性，哪怕是从明朝再上溯一千多年的轴心期世界各文明中，在中国的表现仍是最为突出的。印度的种姓制度隔绝了民族内部，犹太教的上帝唯一选民说隔绝了自身与他者，而中国自古以来虽有“四夷”的认定，但以文化来作为主要标准，相对地模糊了民族间的其他分野。而在共同体内部，则更是以模糊上下的分野而不是以扩大差异为旨归。如孔子虽承认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四类，而以“民斯为下矣”作结，但他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¹²圣人的自我认定为后代立下了不再盲目高估自己的底线。《中庸》则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¹³强调圣人与凡人皆各有极致和所限，两者具有深刻的内在相通性。“人皆可以为尧舜”¹⁴在《孟子》中首次出现，更是开启了底层民众向上攀升的希望之门。这一线索在中国日后的社会阶层流动发展中极为关键。它也是雅俗共赏之经典文学标准得以成立的重要思想基础。

赞同雅俗共赏原则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会干点什么呢？在文学生产环节，他们会调低语言的难度，汉赋式的表达在此时显然再

也难合时宜，白居易式让老妪能解的诗才是正道。同时他们也明了采用种种技巧让人动情从而迷恋的重要性，反对严格基于事实的学究式故事叙述，强调虚构和通俗的必需：“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失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去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¹⁵“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¹⁶在评论领域，评论家们强调通俗、入耳入心乃民众之必需，即使是出于教化，那种高头讲章终究难入平民胸怀。袁宏道记好读书者读书十年后之言：“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话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¹⁷袁中道也有相似言说：“不知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者托不必传者以传。以不必传者易于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马作史，妙得此法。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读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¹⁸此处的“高文大册”与“小文小说”便是“雅”与“俗”的两类文体，而东坡之所以流传千古，“小文小说”所起的作用，甚或高于“高文大册”。清初学问大家刘献廷，闻友人图麟论今世之戏文小说败坏人心最宜严禁，奋起反驳：“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图麟大骇。余为之痛言其故，反覆数千言。图麟捋掌掀髯，叹未曾有。”¹⁹（惜乎这数千言未存）在评价领域，平民百姓对文学作品的欢迎度成为评价其优胜的关键指标。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或许是一个好例。²⁰而白居易的自述则更昭彰显明：“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²¹雅俗共赏原则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地位极其重要。除了以“启蒙”为目的的文学对此原则表示反对或漠视外，中国人基本上不承认单纯精英文学的高贵性，而宁肯在雅俗共赏的作品中寻找人性的相通。这种态度，哪怕到了今天，跟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都是判然有别的，也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标准有相当的差异，这是基于历史根源和民族特性所具有的本质性特征，是文学领域中中国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原则的独特价值及其影响，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与探讨。

对文学作品日趋流行进入人们生活的状况，古代中国其实一直有人关注。唐代李商隐《骄儿诗》²²中的内容可见出三国故事在当时的流行。白居易自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嫖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²¹读者沉迷文学以至模仿代入的情形也有记录：娄江女子俞二娘批注《牡丹亭》，自伤身世，十七岁愤愤而亡。²³被妒妇迫害、被夫君冷落的冯小青写下了绝命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²⁴一痴女子以酷嗜《红楼梦》致病，父母因之焚书，后哭死。²⁵为虚幻文学引发的实际争论更是普遍，甚至进入梦中世界：赵之谦誉《红楼梦》为“小说家第一品”。因对其中的人物不同理解，“梦中复与一人谈此书，久不决。余忽大悟曰：‘人人皆贾宝玉，故人人爱林黛玉。’读者俯首而去。余亦醒。此乃确论也。”²⁵至于图书市场上，雅俗共赏的作品更是有实实在在的销量。郑光祖“偶于书摊见有书贾记数一册云，是岁所销之书，《致富奇书》若干，《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西厢》等书称是，其余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数。”²⁵文学作品生活化的记录，随着文字资料的增多而渐长。

但是在古代中国，这种文学生活化的记录存在种种限制，以致于它无法承担评判文学作品的部分功能。为何？一言以蔽之，就是样本太少、太不充分，所以仅仅被当作个案而拈出，而很难具有代表性、普遍性。产生该现象的缘由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是由于识字率低，普通百姓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大多只能停留于口头这一层面，很难在文字上得以充分表达，故难以生产可供保存的评论文献；二是从事笔记写作的文人，出于阶级、阶层的隔阂，平常少有机会聆听平民大众的精彩评论，故亦无法记录留存；三是社会还没有形成一个舆论公共场地，除非是政治和生活相关极为紧密的诸如灾荒、冤情等话题，其它内容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表和关注；四是整个社会缺少科学研究的习惯和氛围，更不会有人将这些内容当作研究对象和材料专门搜集整理。

但是，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文学生活化的现象日益宽泛并以多种形式被广泛记录，完全有可能作为文学经典认定的一种可计量的材料。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大众识字率和受教育率的显著提升。最新研究指出：“‘七普’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按照通用的学制年限标准，约相当于高中一年级的水平。……这些数据表明，得益于过去几十年的教育扩张，现阶段我国人口的整体教育状况在持续改善；较年轻的队列在其中受益更多，人均教育水平相对更高。”²⁶这样的情况与一百多年前民众主要靠耳朵听书、靠眼睛看戏曲的接受状况相比，已迥然有别。今日的大众，不仅能轻松阅读文本，而且可以用文字和音像形式发表自己的观感和评论，范围之广，无所不包。这也就是说，大众能够充分地将文学作品应用到自己的生活领域。其次，文学生活化的大众表达平台已经存在。随着社交媒体快速发展，大众已根本无需借助古代的雕印、题壁、手抄、演唱或是现代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渠道来表达自己的理解，

而是可以借助微博、微信、博客、网络论坛、抖音、B站等平台畅所欲言，信息流传的广度、速度远非传统传播方式可比。最后，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使得文学生活化的计量成为可能。面对社交媒体上海量多模式式的文学生活化信息，人们已不会束手无策。随着数字人文和计算社会科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基于计算机的数据采集、分类和检索技术日益成熟，基于复杂算法的诸如聚类分析、对应分析等统计方法，以及各种数据的可视化呈现方法日渐推广，这一切使得文学生活化的科学化计量成为可能，而数据的精准给经典文学的认定提供了一种较为客观的依据，这也正是这一新方法区别于传统文学研究基于纯理论推演与思辨之处。甚至可以说，正是大数据时代这种精准认定的可能，使文学经典的雅俗共赏原则真正树立了起来。

二、文学经典生活化的表现形态

经典文学作品的生活化现象，即使在全球领域看都是存在的，当然其意义可能有所区别。

研究者研读文学经典有明显的职业特征。托马斯·福斯特认为，文学教授阅读文学，时时刻刻都不会忘记三个词：“记忆。象征。模式。”²⁷ 哈罗德·布鲁姆则将读书的目的定为四条：清除套话，自我改善，启示他人，善于发明。²⁸ 相形之下，笔者以为约翰·盖尔利的概括更为全面而精当：“学术阅读有其特殊的条件和预期。它是一种工作，以工资和其他形式的认可作为酬劳；它是一种有板有眼的活动，受几十年来的阐释与研究规范的支配；它提倡一定的警惕性，超脱于阅读的愉悦之外，鼓励批判性反思；它是一种公共活动，受到其他专业读者的评判。文学研究凭借以上几点进行自我定义并保持自己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状态”。²⁹ 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撰写学究式的评论和研究论文以及专著，这些成果一般在经过审核后问世，在专业化的领域中发挥作用。简言之，研究者是在职业性这个维度上阅读和评价文学的。

而普通读者的文学作品阅读，则与他们的全部生活息息相通。仅从动机上说，普通读者阅读文学与专家读者就完全不同：首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娱乐和消遣，这是无可争议和无可非议的。其次，出于提高自己学识、素养的目的，借此炫技的也有相当部分，这在青少年读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后，是指定阅读，特别是在意识形态要求和社会主流意识驱动下，读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被指定阅读。这类阅读对于文学经典的普及也是必须的，而且要承认它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普通读者对于优秀文学作品的需要，有着相当必需的理由：

一是认知。普通读者借助文学经典中呈现的人物、社会关系、场景等种种面相，可以简捷地甚至更透彻地认识身边的生活。“作家的职责之一就是描述和命名新的经验。只有在完成了这类创造性工作之后，大多数人才会认识到、进而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困境及其根源。”³⁰ 比如韦小宝就可指代讲义气但又猾头机智的朋友，“二桃杀三士”就可拿来隐喻老板挑拨员工之间的矛盾的某种方式，而武侠小说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式的抢夺秘籍也可拿来指认生活中由优被贬的某种情境。微信朋友圈中出现的感慨：“什么是成长？无非是苦难的 72 变，阻挡你的 81 难”，可见读者下意识地经典文学（《西游记》）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认知过程。认知功能在青少年人群中采用较为普遍，由于他们的生活经验还不够丰富，相当程度上需要由经典文学提供的模式出发来认识现实生活，让他们简便快速地理解社会和人生。尽管其间很可能存在误读和误导，但效率仍是很高的。

二是交流。交流对人们而言尤为重要，它是人类由原始动物进化为人极为关键的推动工具。有了交流，才有合作与竞争。如果交流的主体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相通的文化作为交流工具尤其必需。借助流传广泛的文学经典，可以迅捷沟通个体、形成共识、共情，创造良好的交流氛围。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2000 年和 2001 年金庸在杭州主持的“天堂硅谷峰会”，是为当时引领时代潮流的全球华人圈网络精英峰会。据与会的朋友介绍，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网络精英，文化背景相去甚远，见面除了谈技术外，全靠对谈金庸武侠维系。在此情形下，金庸前来主持，大大方便了技术精英圈子中文化认同感的迅速产生和建立。建立在文学生活化基础之上的交流，可以明显加快人们相互认同的速度，加深彼此认同的程度。

三是表达生命体验和精神追求。文学经典作品经常携带此种功能。当文学经典自觉不自觉地内化于读者心中，这种功能便被经常性地使用，并且在读者心中不断被强化，成为造就某种性格特征、行为风格的主要内因，甚至成为驱动人生前进的动力之

一，有深刻阅读体验的读者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比如在金庸的武学世界中，“多种多样的青少年都可以成为武林高手，不管他出身是低贱抑或高贵、脾气和性格是如何特别。金庸摒弃了对成才之路应该如何走的单线和唯一回答。”³¹读者各随所爱以这些人物的学习成长、体验生命。《平凡的世界》阅读热潮持续不衰，也是因为万千读者认同孙少平这个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进而希望并鞭策自己去奋斗。

经典文学生活化的形式非常丰富，它非常广泛且经常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任何生活空间。下面姑且从六个方面予以罗列归纳：

(一) 专名

专名，这里指文学著作渗入大众生活的各种专门名词。此类品种繁多，略列于次：作家名，作家因其伟大作品而有名。多产的作家，更由于其代表作一时难以遍举，遂以作家名代之，譬如微博有文章，“2021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金庸”³²，便是以作家名指称其所有作品。作家被人称道的广泛与频繁程度，很大意义上便是作家的伟大程度。

作品名。出色的作品自会广泛传播。如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以及鲁迅的很多作品名。值得注意的是，经典化之后，其作品名往往具有泛化含义，可用于指称生活中的诸多现象。“三国演义”常用于指当下的新型大国关系，如“解析中俄美‘三国演义’”³³；“红楼梦”常用来指豪门恩怨或繁华成空的经历；“西游记”可指中国文学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如有著作便名为《〈红楼梦〉的“西游记”：〈红楼梦〉英译趣谈》³⁴；“连城诀”可指城市间的一体化，比如新闻报道，“长三角上演‘连城诀’”³⁵；“神雕侠侣”可指工作或生活中笑傲江湖的贤伉俪，如有报道，“诺奖得主爱德华夫妇：科学界罕见的‘神雕侠侣’”³⁶。不一而足。

人名。这一条要特别与“人物”区别开来。这里专指大众生活中袭用文学作品中著名人物姓名的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在以前发生的概率较低，很少有姓刘、姓孙、姓贾的父母将儿子起名为刘备、孙悟空、贾宝玉。然而，在网络社会出现后，网名中袭用或化用文学作品人物姓名的情形多了起来。有些公司还推崇“花名文化”，以经典文学人物为自己取外号。比如，在阿里巴巴集团里，马云自称“风清扬”，张勇为“逍遥子”，邵晓锋为“郭靖”，彭蕾为“林黛玉”，³⁷等等。

地名。这一条也有两种情形。一是原先著名和不太著名的实地，经过作家的生花妙笔后，其知名度得到更显著的提高。如王羲之笔下的兰亭、李白笔下的桃花潭、天姥山，苏轼笔下的赤壁、石钟山，朱自清笔下的梅雨潭、清华园荷塘，金庸笔下的大理、襄阳、桃花岛、雁门关、风陵渡、烟雨楼、燕子坞³⁸等等。另一是作家虚构的地名，由于其脍炙人口而尽人皆知，如吴承恩笔下花果山、水帘洞、盘丝洞、高老庄，曹雪芹笔下的荣国府、宁国府、大观园、铁槛寺，鲁迅笔下的未庄、鲁镇，金庸笔下的绝情谷、缥缈峰灵鹫宫、华山思过崖等。

其它专名。视作品情况，各种流传开来的其它专名不一而足，不胜枚举。食物名如人参果、唐僧肉、太上老君的金丹、人血馒头等；兵器名如青龙偃月刀、板斧、金箍棒、芭蕉扇、屠龙刀、倚天剑、打狗棒、玄铁重剑等；器物名如羽扇、风火轮、白玉净瓶、圣火令、葵花宝典等；法术名如紧箍咒、定身法、分身术等。其他还有建筑名、服饰名、武术名等等。

(二) 语汇

语汇，大众对文学著作中经典词语广泛袭用，形成一些新的固定语汇。这大抵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况：

名句。唐诗已经作出了辉煌的范例。兹不再举。二十世纪的诗作也可以按此标准予以识别其为经典与否。譬如，我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检索徐志摩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卞之琳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等，可从其使用频率、分布范围和改写程度等方面来衡量其经典性。

成语。伟大作品铸成成语的概率极大。但随着语言的成熟，后来作家贡献成语的难度明显加大。经典作家通常能为语言提供新材料，或是化用前人语言发扬光大，或是自创新语，丰富语言。据研究者考证，苏轼直接或间接创造的成语多达 553 条，其中从前代作品中化用的共 427 条，新创的有 126 条。³⁹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传统的成语产生方式受到极大挑战，作家创造成语的难度极度提高，在此情景下能创造出新成语的作家更为大师。然而，经典作家还是能化用或创造出脍炙人口的成语来。譬如，成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出自朱熹的《中庸集注》，其在“谷歌”中搜索量为 149 万，微博上有 784 条。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将该成语化用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后者在“谷歌”搜索量为 61.6 万，微博上有 617 条⁴⁰，考虑到《天龙八部》成书于 1963 年，至今尚不到 60 年，可见该成语改造的成功性。此外，金庸还新创了“大巧不工”“华山论剑”“左右互搏”等成语，以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无招胜有招”“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等脍炙人口的类似谚语的警句，乃至“布袋和尚——说不得”⁴¹等歇后语。由此可见，经典作家能为民族语言提供丰富的材料，从而实现对民族文化的建构和再建构。

(三)人物

是否塑造出有深刻内涵和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是叙事类经典文学的关键。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如关羽、诸葛亮、曹操、宋江、武松、孙悟空、猪八戒、白骨精、王熙凤、林黛玉等等，都已不可磨灭，并深深影响大众生活乃至民间信仰。现代中国文学也提供了阿 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翠翠、吴荪甫、骆驼祥子、虎妞、觉慧、方鸿渐等一系列经典形象。再以金庸小说而言，塑造了不下数百号深入人心之人物，最典型者如郭靖、黄蓉、黄药师、洪七公、杨过、小龙女、张无忌、乔峰、段誉、令狐冲、韦小宝等等，各具风神、见之难忘。即便诸多次要人物，诸如桃谷六仙、蓝凤凰、平一指、周颠、胡青牛、茅十八、风波恶等，也均有突出特点。据说，20 世纪 70 年代初，越南国会众议员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回骂：“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⁴²可见《笑傲江湖》里的人物在当时的越南可谓人所共知。文学人物是否活在大众的生活中，可以说是判别其所属作品是否经典的一个关键指标。

(四)场景

文学著作中的一些场景，加以精当的概括后被广泛应用于指称类似的生活情况，如《三国演义》中的“三英战吕布”，即可用于以三敌一的普遍情形，“舌战群儒”可指同多人辩论并驳倒对方。《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多被用来指初来乍到的情形。其他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黛玉葬花”、“逼上梁山”“火并王伦”、“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借东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火烧连营”“决战光明顶”“掌门人大会”“英雄大会”“华山论剑”“风陵夜话”等等著名场景，皆可应用于描述具有类似性质的日常活动。比如，在“人民网”⁴³中检索“华山论剑”即可得 1090 篇相关报道。稍作计算便可发现，其中涉及金庸的只有 108 例，不到 10%。绝大部分“华山论剑”用于指各种生活里的事情，诸如“技能大赛”“体育运动会”“主题沙龙”“高峰论坛”之类，领域涉及政治、经济、科技、体育、教育、美食、音乐、影视、网游等。由此可知，“华山论剑”的场景已经高度生活化，远远超出在文学领域的使用频率。某一场景被应用得越普遍，该原著的经典性就越强。

(五)解读、仿作、同人和戏研

一部文学经典自然有多种多样的解读。如果说名著的标准之一是经得起专家读者多角度的反复分析，在民间，它有着更为丰富并且更为切合大众生活的解读。前几年，一个在病床上挣扎搏斗的同学托我出版他自己写的《红楼梦》读解。我惴惴不安地前往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社编辑欣然接受了书稿，说：“你放心。解读文学名著的书都能卖一点。”后来的情况果如所言。蒋勋的《红楼梦》解读甚至可以出到三大卷两千页，大大多于原作的字数。法国评论家夏尔·丹齐格说过：“杰作能够经得住学术派的评论，书呆子的评论，错误的评论。更妙的是：它经受得起天才的评论。”⁴⁴这里的“评论”完全可以替换为“解读”！事实上，经典文学作品因其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必然能为生活其他领域提供参照，提供给人们千百种解读的可能。我们平常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是此之谓。譬如，金庸小说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文学领域，以下著作便是金庸小说在非文学方面的跨学科解读，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金庸小说的跨学科解读

非文学领域	著作名	作者
政治学	《金庸政治学》(一)(二)	叶克飞
经济学	《金庸笔下的经济学》	汤大友、陆新之
管理学	《如何成为带头大哥：金庸武侠中的管理学案例分析》	陈禹安
法学	《金庸武侠中的法律学》	黄豹
社会学	《原来你是这样的大侠——一部严肃的金庸社会史》	吴钩
教育学	《金庸武侠之教育秘籍》	黄宗放
	《有一种教育来自金庸》	岳炜
地理学	《金庸江湖地理》	李攀、国绘
历史学	《金庸笔下真实的大历史》	填下乌贼
哲学、宗教	《天健地坤：金庸小说的哲学观》	曲庆彪
	《金庸小说中的佛理》	廓万禾
民族学	《金庸的中国观：〈书剑恩仇录〉与〈天龙八部〉的文本比较研究》	刘逸中
心理学	《申晨说：金庸职场心理学》	申晨
	《正与邪：金庸小说人物心理分析之〈笑傲江湖〉》	郑玉虎
军事学	《金庸笔下的兵法奇谋》	陈志明
艺术学	《水墨金庸——李志清画集》	李志清
化学	《武侠化学》	李开周
生活	《金庸群侠生活志》	吴钩
职场	《圈子·段子之职场金庸：金庸小说里的公司人智慧》	沈威风

旅游	《与金大侠同游》	郭梅
	《金庸文化旅游地图》	弥今
	《金庸的江湖：和金大侠一起旅游》	刘刚
	《金庸地图》	吴真
多个领域	《六神磊磊读金庸》	六神磊磊

	《你我皆凡人：从金庸武侠里读出来的现实江湖》	六神磊磊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透过金庸〈鹿鼎记〉看清初政治、生活与文化》	管彦杰

上述著作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六神磊磊对金庸的创造性解读。他善于假借金庸书中的故事和人物，运用春秋笔法，借古讽今，在金庸小说中挖掘其当下意义，将其类比于生活的场景。比如，《曼陀山庄的形式主义》一文描写了王夫人明明不善于种茶花，却偏偏自诩种茶花专家，而且要求下人完全按照自己的错误要求来种花。作者进而指出，形式主义的本质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逐级的忠诚检查。《金庸会议学》一文则历数金庸小说中的各种会议，最后总结出一条开会铁律：会议的重要性和参会人数呈反比。⁴⁵简言之，六神磊磊对金庸的解读，大量使用隐喻的话语表达，将小说情境与时事热点相结合，进行意义建构和价值呈现。

46

仿作对于文学经典来说也属必须。晚清以前对于四大名著的续作便层出不穷。还有一种仿作更为直接，即把经典的文本全盘拿来，仅仅替换几个关键词，譬如，模仿《多收了三五斗》的《多发表了三五篇》以戏谑的手法对高校科研工作人员的状态进行了白描。

还有一类是同人小说，同人小说是一种利用现有作品特定元素进行二次创作的文学创作形式。近年以来，《悟空传》《八戒日记》《李逵日记》等网络小说的流行，也直接证明了古典名著魅力长存。金庸小说也拥有众多的同人作品，最有名的当属引起著作权侵权的《此间的少年》。其他还有《笑傲青城》、《笑傲江湖之徒手逍遥》、《倚天屠龙飞鹰记》、《执掌光明顶》、《天龙里的剑客》、《全真门徒》、《射雕之杨康列传》等等。

此外，戏研是新出现的一种文体。它采用正宗的学术研究形式，内容却以虚构文学为主体。这种著作刚刚出现却也能风行一时。比较典型的有新垣平的《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和《剑桥倚天屠龙史》。⁴⁷其中《剑桥倚天屠龙史》共分十二章，有八个附录。章节中有“元朝中期政局变动与汝阳王藩府的崛起”“武当的崛起及其与少林的冲突”等，附录中则有“谢逊思想传记”“韦一笑传”“小龙女身世考”等内容。可谓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六) 衍生作品

衍生作品，指以文学经典为蓝本，在文艺其他领域衍生生成的各类作品。古代时期的衍生作品多以戏曲、评话等为主，到了如今，衍生作品更是种类繁多，电影、电视剧、歌曲、动漫、游戏、文创等等，不一而足，充分展现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威力，同时也表明了大众文化对经典文本的渴求。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10月，以金庸小说为题的电视剧已超过八十部，电影也有约七十部，漫画则逾九十种，至于与金庸影视相关的歌曲，粗略估计，也直逼三百首。其他周边商品，更如恒河沙数。”⁴⁸金庸小说的各种文创产品也从平面走向实体，各种文创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印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对联的书包、胡椒粉罐和盐罐、银器吊饰、信用卡，印上各种金庸小说名称或小说人物的年历、钱包、手表、扑克牌、电话卡、鼠标垫、笔插、笔记本、书签、厕纸、抱枕、雨衣、T恤、手机壳、茶杯和咖啡杯，还有金庸漫画人物实体化的公仔。⁴⁹由此可见，金庸小说经典化程度之深。

上述种种经典文学生活化的形式在大数据时代大多是可以进行定量计算的。大数据改变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如今数字人文和计算社会科学研究蓬勃发展，以往通常视为主观化的人类行为，比如文学欣赏和评论、情感好恶、价值观演变，在大数据时代都可以追踪、归类、量化并计算。作为文学经典化表现的文学生活化也不例外。譬如，我们可以从微博上提取到人们对文学内容、文学形象、文学语言的使用情况，以此考察其在生活中的渗透程度，进而对其渗透性进行计算。有学者指出，“2010年与1610年相仿佛。数字文本和话语的激增和存档，以及分析工具的更新和计算方法的便捷，使得21世纪成为发明望远镜和显微镜的17世纪初的时代翻版。如今所能观察到的不同时空及文化语境中的型式，其规模不啻为以往的数百万倍。无论

身在何处，借助此类新工具，即可发现有趣的新兴型式。”⁵⁰这也是文学经典化在大数据时代所呈现出的新气象。

需要承认的是，虽然我们已身处大数据时代，有着先进的测量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生活化的一切都已测量出来了。换言之，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文学生活化现象仍只是冰山一角。首先，当下的文学生活化手段大多是基于语言形式的，而形式的多义或歧义现象在计量中便较难处理。譬如，成语“凌波微步”首见于曹植的《洛神赋》，而“带头大哥”原本便是日常用语，那么从大数据搜索到的“凌波微步”“带头大哥”的频率在大多程度上应归功于金庸小说的影响，便很难估算。而且，语言形式有诸多变体，有些变体通常会出乎意料，这也难以检索。譬如，大数据中可检索到用以指外科医生的“胡一刀”，以此可测算金庸小说的影响，但可能会漏掉其他形式变体，如“湖一刀”“沪一刀”“令狐一刀”等。其次，当下的测量手段大多依靠书面文本，而口语中的文学生活化现象很难测量。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不清楚在全国范围内，有多少人的绰号是“白骨精”“诸葛亮”“林黛玉”“黄蓉”或“老顽童”，我们也不知道一天之中有多少人使用了“这个白骨精”诸如此类的表达，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数量必然大于大数据所能测量到的数量。最后，非文字形式的多模态化呈现的文学日常化现象很难测量。比如，根据金庸小说所创造的文创产品，如年历、钱包、笔记本、茶杯、公仔等等，这些产品一年销售了多少？销售到何处？这些也很难计量。更别说经由金庸小说所增色乃至形成的旅游景点，如大理、桃花岛、断肠崖（位于浙江雁荡山）等，其知名度有多大程度得归功于金庸，这些都是很难计量的。然而，这些又都是实实在在的文学生活化的表现，只能说文学经典已经融入到生活的毛细血管之中，我们目前所能提取到的只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一小部分，也即冰山一角。文学生活化更多的表现仍有待于工具和算法的优化才能提取出来。

然而，即便如此，以生活化的种种指标来评判文学作品是否经典，是一条在目前的条件下可行的途径。人们对此的质疑一般可能会从以下两个角度提出：一是普通读者的审美能力不算很高，是不是会出现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的结果。二是时代的流行经常会盲目，是不是会发生潮流漫过全无留痕的情形。针对以上的质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回答：一是由于取样的极端广泛性，个体的偏差会被大规模的行为所纠正。此正是大众之所以存在的意义所在。而且，普通读者对文学经典的鉴赏能力，在之前被大大低估了。孙郁曾言，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时，偶尔会翻看观众留言，发现各行各业喜欢鲁迅的人很多，深读其文者，领会力并不亚于文坛作家。民间有高人，他们在生活的基层，带着生活的疑问走进书本，那神态里有生命初始体验的感受，而对于文字敏感，社会的认知，为许多书斋中人所不及。⁵¹二是确实存在某些文化产品短暂流行过后却了无留痕的现象，每个时代均有自己的流行主题，但这只要通过拉长取样的时间长度，就可非常有效地弥补。笔者郑重提出的参考期限是：60年左右持续走红，凡是其生活化程度不稍衰减的，基本上就可直接认定为文学经典。提出这个期限，依据的是中国的一句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味的是两代人的时间长度。以20世纪40年代活跃在“孤岛”上海的作家而论，经过60年的大浪淘沙般的过滤，如今仍留在大家的阅读视野中的，恐怕只剩下钱钟书的《围城》和张爱玲的小说。据最近的报道，张爱玲早期的短篇小说集《传奇》是1944年在上海出版，一时洛阳纸贵。2005年，新版的早期短篇小说集《倾城之恋》销售大概50万本，一路到2020年每年都维持这个数目左右。⁵²60多年后仍有广泛阅读，从这个标准来说，张爱玲完全可以跻身经典作家行列。再以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港台新武侠小说为例，经过60多年的磨砺，目前能被广泛生活化的武侠作家也仅存金庸一人。这种认定，比起学者们在学术领域的同样努力，似乎显得更为有力和有效，更有直接的说服力。它确实是文学在经典化过程中是否取得成功的一个可靠的佐证。

三、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到底是不是经典作家，一方面需要看他（她）吸引了多少专家的关注。聚焦于某些作家和作品的众多的研究者证明了这个判断，如红学和鲁学；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一个大致可控的统计范围获得一种定量的结果来判定，比如王兆鹏等通过对历代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评点资料、当代唐诗研究论文三个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并加权计算，排列出了唐诗百首名篇的排行榜。⁵³如上的观察可以说还是围绕单纯的文学领域来进行的。如果把作品推向更广阔的存在领域，一个作家到底是否经典，也可以从其作品的生活化的广度、深度和延续长度来判定。这种日常化的、可能是无意识地 and 潜意识的引用和应用，也许比权威学者的判断来得更为真实和真切。经典的成就有相当的原因是来自生活化。而在当今信息时代来临，大数据为经典文学作品的生活化的程度的判定，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条件，虽然有些技术问题尚待破解，比如，如何在极其庞大的互联网世界中获得

有效数据；需要建立哪些基础数据库；探索并确立一整套精细化的分析标准与模型等，但是这条路径在数据技术取得跃升发展后，应能在经典化研究中将先前因无法获得确定性认识而被忽视的内容纳入研究视野、得出结论。因此，这也许是今天及未来衡量文学经典不可或缺的、有效的且较为广阔的新路径。

注释：

1 如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王宁：《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季广茂：《经典的由来与命运》，《励耘学刊》（文学卷）2005年第1期。

2 哈罗德·布罗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3 中国日报网：《“疫苗(vaccine)”当选〈韦氏词典〉2021年度词汇》，<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2111/30/WS61a5d467a310cdd39bc78728.html>。

4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正文前序。

5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第1页。

6 刘洁修：《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开明出版社，2009年，第1312页。孙仁孺：《东郭记》卷上，中华书局，1959年，第17页。

7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6页。

8 邓小南：《推荐序》，小岛毅著，《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何晓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卷首。

9 李清照：《论词》，见蒋述卓等编：《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39页。

10 黄升：《花庵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11 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前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12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75、70页。

1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

14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276页。

15 金丰：《新镌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序》，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2页。

16 罗浮居士：《蜃楼志序》，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525页。

17 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钱伯城点校，《袁宏道集笺校》（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35页。

-
- 18 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45页。
- 19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第二，汪北平等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第107页。
- 20 郑还古，薛用若：《博异志集异记》，金文明选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7-118页。
- 21 白居易：《与元九书》，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93页。
- 22 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57页。
- 23 见汤显祖：《哭娄江女子二首》小序，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全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98页。
- 24 事见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诗见张贵胜：《遣愁集》卷十三，中国基本古籍库，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 25 (13) (14) 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347、376、365页。
- 26 牛建林：《中国人口教育发展的特征、结构性矛盾与下一步思路——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和相关人口教育统计的发现》，《教育研究》2021年第11期。
- 27 托马斯·福斯特：《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王爱燕译，南海出版公司，2016年，第5页。
- 28 哈罗德·布罗姆：《如何读为什么读》，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 29 转引自芮塔·菲尔斯基《文学之用》，刘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 30 利奥·洛文塔尔：《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甘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 31 卢敦基：《论金庸小说“武”的创新：一个现代武侠小说的演进视角》，《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32 朗声图书：《2021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金庸》，<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97990395986071>。
- 33 伍俊飞：《解析中俄美“三国演义”》，<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JAejg>。
- 34 肖维青：《〈红楼梦〉的“西游记”：〈红楼梦〉英译趣谈》，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
- 35 蒋蕴、王国锋、徐晓恩等：《长三角上演“连城诀”》，《浙江日报》2010年3月29日，第9版。
- 36 东亮：《诺奖得主爱德华夫妇：科学界罕见的“神雕侠侣”》，《新青年（珍情）》2015年第10期。
- 37 Bilibili 专栏：《阿里程序员为什么都要起花名？连岳不群、田伯光都被占用了！》，<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669248>。

-
- 38 详见李攀、国绘：《金庸江湖地理》，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
- 39 梅馨月：《苏轼对成语的贡献》，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 40 以上数据检索时间为2021年12月27日。
- 41 见微博“YY诉流年”：“再说，谁家偶像也不是布袋和尚——说不得，有些粉丝求求你别看球了，偶像有你喜欢那是偶像的不幸。”<https://weibo.com/u/3161361164>。
- 42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新星出版社，2021年，第3页。
- 43 网址为<http://search.people.com.cn/cnpeople/news/index.html>。检索时间为2021年12月27日。
- 44 夏尔·丹齐格：《什么是杰作》，揭晓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9页。
- 45 六神磊磊：《六神磊磊读金庸》，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425页。
- 46 张璩尹，李沁柯：《话语的“江湖”突围：时评隐喻建构的价值呈现——基于对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的研究》，《理论月刊》2020年第12期。
- 47 新垣平：《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新垣平：《剑桥倚天屠龙史》，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
- 48 邱健恩：《从金庸小说到金庸小说现象》，<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18-11/12/30946.html>。
- 49 邱健恩：《金庸小说：从文字到文创》，《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 50 Liberman, M: More on “culturomics”, 2010, <https://languagelog.ldc.upenn.edu/n11/?p=2848>。
- 51 孙郁：《在民间的鲁迅》，《文艺争鸣》2021年第11期。
- 52 宋以朗：《“久悦”与爱玲——〈久悦记〉序》，《文艺报》2021年11月3日，第8版。
- 53 王兆鹏、孙凯云：《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